

“瓮安事件”再调查

新华社高级记者、新华社贵州分社原社长著书揭秘“瓮安事件”
提出“新群体事件观”——

没有不讲道理的群众 只有偏差的执政理念、方式和作风

瓮安事件发生时，新华社高级记者、原新华社贵州分社社长刘子富已经离开新闻一线，但他仍对此事件予以高度关注。在瓮安街头人心未定之时，刘子富即自己开车前往瓮安，探察民情民意。在得到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的支持后，他再赴瓮安，进行了为期14天的调研，采访包括事件后被撤职的县委书记、事件中受伤的干警、被关押的闹事者在内的87人，著成14万字的《新群体事件观》，于近日公开出版。

刘子富在书中提出的“新群体事件观”，即现场第一原则、就事论事原则、第一时间公布事件真相原则、反思自责原则、问责制原则以及慎用警力原则，既是对贵州省成功处置“瓮安事件”的系统的总结，也对各级领导干部化解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作用。

□快报记者 言科

一赴瓮安

致信省委书记受肯定

震惊全国的“6·28瓮安事件”发生的当天，新华社贵州分社的记者即由一名副社长带队赶到瓮安，而在贵阳的刘子富也在第一时间知道了事件。

“我们的记者到达现场，为了自我保护，更为了掌握第一手信息，都没有暴露身份。一名摄影记者甚至把照相机藏在了菜篮中，以接近现场拍摄。”刘子富回忆道。

新华社采访组的负责同志还多次打电话给刘子富，虽然他已经很忙。电话一打就是几十分钟，他在电话里强调：“千万不要给事件盲目定性，不要轻易说是黑恶势力在幕后指使，要想群众绝大多数是好的。”

基于这个基调，采访组在事件发展期间，后期处理期间发出大量稿件。而采访组回到贵阳后也找到了刘子富，多次沟通、策划报道。出于一名老新闻工作者的使命感，刘子富决定一赴瓮安，虽然当时的瓮安仍然处于风暴中心。

在事件发生的十天后，他开着带着爱人来到了瓮安，这个他曾多次来过的地方气氛显然仍很紧张。“县城已经是一片废墟，县政府、公安局还在被修。抓了一百多个人，群众人心还不稳，街上还是有点乱。”

去之前，刘子富参阅了大量公开报道。而其时，贵州省省委已启动了问责风暴，瓮安县委书记王勤、县长王海平相继被撤职，新的公安局局长和政委也任命到位。“当时觉得省委很了不起，做到了信息公开，让媒体自由报道，同时迅速启动了问责机制，也很有魄力。”

“那次去瓮安并没有写书的计划，去的目的，只是想做一次社会调查。”刘子富那次和新到任的县委书记龙长春谈了三个半小时，而县公安局的副局长做了沟通。“他处于人生和事业上的低谷，很是沮丧。”刘子富说，即使如此，这位43岁的原县委书记还在读书。事实上，刘子富对王勤的印象还不错：“他没有把责任推给自己的副手，还是一人担了起来，而且对党委和政府没有任何埋怨。”

采访中，王勤谈了自己的教训。

他说了自己在2004年参与处置的一起群体性事件：构皮滩水电站淹没区移民因补偿问题，将几名干部扣下作为“人质”，在贵州省省委党校学习的他请假回到了瓮安，赶到现场时，只见到移民的手提棍棒，有的手握大刀，有的手抓石灰粉，还有他的手抓辣椒面，场面一触即发。

王勤做了最坏的思想准备，将钥匙、工资卡、钱包交给驾驶员，自己下江边，但什么也没有。

体性事件的发生，是因为群众合理的诉求找不到说话的地方，只能用群体性事件来解决。

这封信递呈给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后，石宗源没有批示，而是直接让人把刘子富请到了办公室，进行了两个小时的长谈。

“谈起来后发现，我们在很多问题上的观点是相同的。”刘子富回忆说，石宗源谈了自己的看法：“应当即时把真相向人民群众公布，向媒体公布，不让谎言去误导群众。落实人民的知情权，让群众了解真实情况，寻求群众的谅解，矛盾才不会尖锐化。”

这次会谈中，石宗源请刘子富针对瓮安事件做一次深入、细致的调研，并和瓮安县委打了招呼，要求瓮安县委“积极配合，全力支持”。

再赴瓮安

14天调研引发对事件再思考

去年9月底到10月初，刘子富再赴瓮安，进行了为期14天的调研。

因为有了当地县委的配合，这次调研范围大且密度高，“我共采访了87人，包括新老县委书记、县人的主要领导、公安局的干警、群众，也去了看守所采访了因为打砸抢烧而被处理的学生。”

值得一提的是，刘子富见到了因为瓮安事件被撤职的原县委书记王勤。这是王勤继新华社记者后接受的第二次采访，也是到目前为止仅有两次。

王勤其时赋闲在家，埋头苦读并对事件进行着深刻反思。他一开始只答应谈一个小时，而事实上最后和刘子富谈了三个半小时。

“他处于人生和事业上的低谷，很是沮丧。”刘子富说，即使如此，这位43岁的原县委书记还在读书。事实上，刘子富对王勤的印象还不错：“他没有把责任推给自己的副手，还是一人担了起来，而且对党委和政府没有任何埋怨。”

采访中，王勤谈了自己的教训。

他说了自己在2004年参与处置的一起群体性事件：构皮滩水电站淹没区移民因补偿问题，将几名干部扣下作为“人质”，在贵州省省委党校学习的他请假回到了瓮安，赶到现场时，只见到移民的手提棍棒，有的手握大刀，有的手抓石灰粉，还有他的手抓辣椒面，场面一触即发。

“他当时的想法是，这个事情太小了，要上上级的态度，另一个担心是怕死人，他自己也觉得万幸的是，事件中没有人死亡。”

王勤做了最坏的思想准备，将钥匙、工资卡、钱包交给驾驶员，自己下江边，但什么也没有。

新群体事件观 ——贵州瓮安“6·28”事件的启示

刘子富 著



2008年6月28日下午，一些不明身份的人正在捣毁瓮安县公安局的警车，其中有不少青少年

杨楹 摄

听不进去的移民将他也“扣”起来，他依靠当地村委会主任和村民，找来农民的旧衣服，将被围困的干部化装成农民，利用天作掩护，把他们全部解救出来了。

“他说自己没有去现场，并不是考虑自己的个人安危。”刘子富说，心理上的依赖使王勤在面对如此大的事件时束手无策，被领导等着上级判断并下命令。但他也错了，将事件控制于最小范围的最好时机。

“他当时的想法是，这个事情太小了，要上上级的态度，另一个担心是怕死人，他自己也觉得万幸的是，事件中没有人死亡。”

王勤做了最坏的思想准备，将钥匙、工资卡、钱包交给驾驶员，自己下江边，但什么也没有。

过程中他都在发抖，因为紧张，也因为害怕，坐下好几分钟才镇静下来。”这是个来自单亲家庭的孩子，父母离异后，他被判给父亲，但父亲却顾不上照管他，无奈的孩子只好跟着母亲过日子。他既没有得到父爱，也享受不了家庭的温暖，更谈不上受到家庭的良好教育。

“6·28”那天，孩子听同学讲县府政府有人闹事，就同几个同学一道跑去看热闹。“哇！从来没有见过的热闹，从没见过的新鲜，从来没有过的激情，从来没有过的冲动！”他说。

他跟着人群冲进县公安局大楼，在一片鼓掌声、“加油”声中，他的思想、情绪、行为全部失控。一时间稚嫩的叫喊，付出了被依法收容管教3年的沉痛代价。

“他期盼着的，是早日回到教室。他既是打砸抢烧的参与者，更是教育缺失的受害者。”

定稿时，刘子富为书起名为《新群体事件观》，那么何谓新群体事件观？

他的解释是：“我国的社会进入了转型期，在社会经济建设过程中，不断会遇到新的矛盾和挑战，社会矛盾高发。而发生矛盾和摩擦时，已不能用传统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因为这是内部矛盾，不具对抗性，不具有政治诉求和目的。应该用化解、疏导、服务的原则和方式来处置群体性事件。”

“群众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甚至严重缺乏安全感，导致当地党委、政府与群众的‘鱼水关系’，逐步演变成令人痛心的‘水火关系’。”一位县人大代表在开座谈会时说，黑势力比公安机关的势力还强大，5分钟可以召集几百人，而公安机关2小时都招不齐这么多人。

“他们说：‘瓮安在文化大革命最乱的时候，也没烧县政府，没冲进公检法机关，这次事件如果县里主要领导及时赶到现场来，站出来与群众对话，或者州里有领导出来真心诚意的对话，解释，事情绝不会闹到如此严重的地步。’

“他们认为：‘无论发生天灾还是人祸，事发地主要领导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往往能够起到稳定人心、扭转局面、控制局势的关键作用。’

“瓮安事件的干部，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线索予以高度重视。”

“瓮安事件的干部，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线索予以高度重视。”

“瓮安事件的干部，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线索予以高度重视。”

“瓮安事件的干部，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线索予以高度重视。”

“瓮安事件的干部，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线索予以高度重视。”

“瓮安事件的干部，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线索予以高度重视。”

“瓮安事件的干部，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线索予以高度重视。”

宗源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委婉地提出：“您的事情比较多，我写出来，您找个水平高的秘书看一下就行了。”

石宗源的回答是：“我哪怕一天看30页，也要把书看完。”

今年2月27日，书稿初成，刘子富请人把书稿递送给了石宗源，石宗源当天立即让人把书稿送了回来，并附了一封信：

“子富同志：书稿粗略看完了，你辛苦了，向单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为本书作序）表示感谢，4处有修改，仅供参考。”

“他是当天就看完了，而且提出的修改意见，都是在技术层面上的，如标点符号和时间顺序上的错误。”刘子富很感慨，对一个如此敏感的事件，在事件发生仅8个月就同意公开出版书籍，已经非常不易。而没有对书中的观点提出修改，更见石宗源对他的尊重。

他跟着人群冲进县公安局大楼，在一片鼓掌声、“加油”声中，他的思想、情绪、行为全部失控。一时间稚嫩的叫喊，付出了被依法收容管教3年的沉痛代价。

“他期盼着的，是早日回到教室。他既是打砸抢烧的参与者，更是教育缺失的受害者。”

“瓮安事件的干部，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线索予以高度重视。”

瓮安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干部不到现场，不敢面对群众，回避矛盾，反应迟钝，措施不力，贻误控制事态良机，丢掉了阻止事件升级的最后一道“防火墙”。

瓮安不少干部群众反思“6·28”事件的教训时说，其实群众是通情达理的，是拥护党和国家的，只是不明事情真相，心中有怨气，关键时刻只要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连面对群众，就不会闹得不可收拾，处置“6·28”事件就不会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

“如果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出现在群众面前，局面上就不会失控，就不会发生如此大规模的暴力冲突。”

受访的当地干部群众纷纷这样说道。

“瓮安在文化大革命最乱的时候，也没烧县政府，没冲进公检法机关，这次事件如果县里主要领导及时赶到现场来，站出来与群众对话，或者州里有领导出来真心诚意的对话，解释，事情绝不会闹到如此严重的地步。”

“他们说：‘瓮安在文化大革命最乱的时候，也没烧县政府，没冲进公检法机关，这次事件如果县里主要领导及时赶到现场来，站出来与群众对话，或者州里有领导出来真心诚意的对话，解释，事情绝不会闹到如此严重的地步。’

“他们认为：‘无论发生天灾还是人祸，事发地主要领导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往往能够起到稳定人心、扭转局面、控制局势的关键作用。’

“瓮安事件的干部，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线索予以高度重视。”

柒纵深



在2008年6月28日14时至20时的6个小时的关键时段中，瓮安县委、县政府和县公安局的主要领导没有出现在现场，没有面对群众，阻止事件升级的“防火墙”最终崩塌 瓮安县新闻中心提供

瓮安事件回放



在瓮安“6·28”事件中被焚毁的公安局办公楼 杨楹 摄

少数不法分子趁机打砸抢烧，现场浓烟滚滚，一片喧嚣 杨楹 摄

2008年6月28日，瓮安。一起因女中学生李树芬溺水身亡而起、已经发醉了一个星期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爆发。

整个事件的过程早已广为人知：李树芬家属对警方认定的“自杀”死亡原因不服，在与民警发生冲突后，李树芬的叔父被不明身份者袭击受伤，而警方又让家属将尸体交出，才得以送医治疗。为了防止警方强行处置尸体现场，28日下午3点多开始，家属及围观者300多人拉起条幅前往政府请愿。

19时许，州公安局负责人驱车赶到现场，遭到一些小青年指着鼻子谩骂，他当即打电话向王勤汇报现场情况。王勤立即打电话给县教育局局长张世德，要求通知各校校长到现场疏导学生。接到指示的张世德立即通知城区各校校长安排老师到现场疏导学生。但此时聚集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警戒线受到冲击，并有人冲进公安局大楼，一直等到29日凌晨从贵阳连夜赶往瓮安的贵州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厅长崔亚东抵达。

当天下午，县委书记王勤、副县长